

中国经济出版社

陶文昭 编著



拒绝霸权

与2049年的中国对话

丛书主编 张新

与 2049 年的中国对话

拒 绝 霸 权

陶文昭 编著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师少林 杨岗

拒 绝 霸 权

陶文昭 编著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100037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渤海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3.25印张 34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1~10000

ISBN 7-5017-4047-x/F·2927

定价:29.00元

第一部：告别霸权

一、联合国的百年转折	(2)
首位华裔秘书长	(3)
秘书长的惯例	(5)
新型秘书长	(9)
解散安理会	(17)
大国的催产	(18)
安理会的特殊安排	(28)
走出安理会	(35)
二、变化的多极	(49)
美国：超强与衰落	(52)
曾经超强的美国	(52)
“领导世界”的困惑	(60)
褪色的霸权	(71)
西欧：超国家与半国家	(76)
顺应潮流的联合	(76)
大国主导之争	(83)
超国家的尝试	(87)
俄罗斯：熊与骆驼	(93)
民族主义与“门罗主义”	(94)
东西之间	(103)
日本：侏儒与巨人	(110)
仿造的终结	(110)
贸易的逆转	(114)

政治大国之梦	(118)
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分化	(128)
艰辛的发展	(130)
半壁江山	(140)
政治：地区性组织	(143)
地区霸权与整合	(150)
中国：力与义	(157)
历史性的跨越	(157)
反霸与不称霸	(167)
谦谦巨人	(175)
克“力”扬“义”	(181)

第二部：黄天当立

一、超越太平洋	(190)
中美：强者的对话	(199)
敌手与握手	(200)
多事之秋	(210)
贸易的较量	(224)
历史的超越	(234)
台海风云	(242)
中美关系的敏感中枢	(242)
历史的责任	(250)
政治决定	(255)
虚拟封锁	(264)
中华一统	(270)
中日：一衣带水	(275)

历史的反思	(276)
经贸平等与竞争	(283)
安全疑虑与信任	(291)
大国构架	(300)
中国与东盟：波澜不惊	(306)
无风的波澜	(307)
海上军情	(315)
双赢的竞争	(323)
南海之波	(329)
二、周边与世界	(334)
中俄：背靠背与手挽手	(334)
关注西部	(335)
历史的教训	(338)
政治背靠背	(344)
经济手挽手	(348)
睦邻与战略合作	(354)
中印：毗邻与天涯	(357)
板块的裂缝	(357)
谁是代表	(360)
发展的竞争	(365)
难解的冰点	(369)
超越喜马拉雅	(373)
面向亚非拉	(376)
放眼世界	(377)
中国与中东：从丝绸之路到石油之路	(379)
中国与非洲：政治表征与经济实质	(383)
中国与拉美：突破“后院”	(395)

三、炎黄同庆	(404)
根深干大的传统	(405)
新老两代华人	(408)
关怀与反哺	(412)

第一部：告別霸權

一、联合国的百年转折

2045年10月24日，是一个全球欢乐的节日。地球村上的80亿村民彻夜联欢。传统的所谓南方国家的人民更是兴奋异常。刚刚开完联合国百年庆典大会的联合国秘书长皮斯·李，驾着飞机连夜赶回到太平洋小岛的故地，与那里的乡亲们围着篝火，跳起了热情奔放的“恰恰”舞。

是的，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风雨兼程的联合国终于走过了它的100年，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如果说“五年小庆，十年大庆”，那么百年正是“大庆的大庆”。更为重要的不是数字在量上累积到一个三位整数，而是联合国组织本身发生了历史性的质变。第99届联大终于解散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议案最终通过。联合国告别了霸权政治和寡头政治的时代，迎来了一个更加民主和平等的新时代。

皮斯·李（即李太平）是这个历史转变的见证人。这位联合国的新任秘书长在联合国工作了30余年，亲眼目睹了联合国在21世纪的演变。对现今转变的感受尤为深刻，情绪尤为激动。此时此刻，他有许多的言语要倾吐个痛快。这个时候，自然想起了在北京郊外的老人——闻潮教授。

皮斯·李在兴奋的凌晨拨通了求学时中国师长家的电话。

作为国际政治学的资深教授，闻潮先生在教研究生涯中鼓吹国际政治的和平和民主，半个世纪过去了，和平与民主如一江春水，越

过山重水复还是滚滚向东。二战以后 100 年中，尽管世界摩擦不断，但主要国家的大战始终没有出现。战火越烧越小，体育比赛越来越多。国际民主亦如原上的野草，在霸权主义和实力主义的野火之中，萌发着理想的生机。现今国际政治民主如一面旗帜，不管哪个国家，无论愿意与否，都不能不打着这面旗帜。最初那些大国阳奉阴违，如今被迫走向“阳奉阴违”。联合国安理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大国的角斗场。如今安理会通过改组和扩大的改良，终于走到它的终点。存在了 99 年的安理会的解散，在国际政治发展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闻潮教授作为一名学者，作为一名相对清醒的旁观者，为能看到这一天欢欣鼓舞。而这一天的到来，了却了老人毕生的心愿，仿佛除去了卡在咽喉中的骨头，顿感无比轻松。老人这一段时间精神非常放松，退休这许多年总有轶事念念于怀，原来是自己的深深扎根的民主情节。如今大事已了，才有真正的退休之感，同时萌生了失落的情绪。

北京北郊小汤山的别墅里，电话铃声打破清晨的宁静。本来人上了年纪觉睡得越来越少，每天也就睡上四、五个小时。也许是轻松和失落，也许是连日的疲倦，这次闻潮教授不比寻常地睡得很沉。

皮斯·李的电话铃声唤醒了老人。在可视电话中，他们进行着越洋的对话。

首位华裔秘书长

秘书长原来是一位炎黄子孙。皮斯·李是英文音译，按中文的意思就是李太平。他的父亲李锦松，是中国中部一个小村庄的一户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的众多儿子中的一个。普遍的贫穷使得众多的

哥哥姐姐没有受过甚至是初中教育。李锦松却幸运地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届大学生。在户口迁移的时候，他将用了16年的名字李连根改成了李锦松，这样或许改掉些土气，抹上些灵气。村里的娃娃没有到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见识少并不意味着心地小。李锦松凭着自己的才智硬是挤进了京城著名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在那时的出国潮中，他又到达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顺利地拿到了学位，还与那时许多同伴一样获得了永久居留美国的“绿卡”。对李锦松来说，那时才20多岁，过去祖祖辈辈的毫无机会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到处都是机遇，风帆正满与高歌前进，春风得意与阳光灿烂，一切形容都不为过。

然而过了三十而立，人生似乎晴转多云。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度，过上好生活要靠好的谋生手段，学工学理的还勉强凑合，但难以进入所谓的主流社会。学国际政治的日子愈加不好过。虽然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外来移民成为名噪一时的美国国际政治的高官，那也不过是他们卓越的才识与美国权势集团的偶然结合。异乡人在这条道路上的发展的确是难之又难。李锦松终于离开美国到天高皇帝远的澳大利亚西部州立大学任教。穷乡僻壤又用不着国际政治，到澳大利亚又是一次失算。这时的人生气候真的是多云转雨。李锦松在四十不惑之年最终痛下决心，带着妻子儿女迁居到太平洋的小岛。皮斯·李随父亲归化为岛国居民。

皮斯·李中学毕业，岛国教育不发达，父亲把他送回中国留学，既是为了他能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也是因为中国成为世界留学的新的热点。李锦松把爱子托付早年的同窗加同乡闻潮教授照管，因此，皮斯·李与闻潮教授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叔侄之情。

秘书长：闻先生，您好！我是皮斯·李。电话好长时间没有人接，是不是先生刚才晨练去了？

皮斯·李与导师常有联系，知道他退休以后有晨练的习惯。所谓的晨练，既不是跑步，也不是打太极拳，只不过是山在小汤山的山

青水洲的小路上散散步，吸吸新鲜空气。

教授：小李，你好！这几天睡得很沉。刚才还是你的电话铃充当了闹钟。

在非正式场合，闻潮先生总是按照中国的习惯用昵称称呼皮斯·李。

秘书长：先生，打搅了。我是在家乡给您打电话。刚刚参加过通宵的庆祝活动，兴奋不已才找先生聊天。

秘书长的惯例

联合国秘书长是一个有数万雇员的庞大机构的“首长”，同时又只是这个世界组织的“秘书”。在“秘书”与“长”的角色之间，酸甜苦辣自在其中。

教授：我已经看到你脸上的兴奋之情。此时此刻，你这位新任秘书长感受还真不少。

秘书长：在我接任联合国秘书长之时，这个位子已送走了12位前辈。按中国的说法，就是整整一打。谈我个人的感受，不如谈秘书长这个职位本身给人的感受。

教授：秘书长的位子并不好坐。你今天主要任务是如何促进国际社会的发展，如何有效实施国际民主，而最初的几位却忙于在大国之间周旋。

联合国成立时大国之间的分歧，使起初几位秘书长吃尽了苦头。特别是最初几十年苏美冷战，超级大国之间的不共戴天，使得秘书长这位号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秘书”，在两个对立的“首长”之间左右为难，处境尴尬。

秘书长：据历史记载，我的第一、第二位前辈的结局堪称不了了之。

教授：万事开头难，充当这个普遍性国家组织的首脑，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工作。

第一位秘书长挪威人特里格夫·赖伊颇有雄才大略。这是最容易理解的。如果把联合国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国家，秘书长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第一任秘书长则是开国元首，肯定不会是庸才。赖伊真的把自己当作领袖，对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和表决结果施加影响。不知不觉之中，他得罪了大国。第一任期满之时，苏联就有意否决他的连任，虽然后来勉强延长了三年任期，还是不得不怀恨辞职。直到离开秘书长的位置，这位先生恐怕还未弄明白，秘书长的含义究竟是“秘书”还是“长”。赖伊或许想当一把“长”，结果连“秘书”也干不成。

第二任秘书长更具有悲剧色彩。这位瑞典的著名单身汉哈马舍尔德，吸取前任的经验，做事小心谨慎。然而，“常在河边走，难免不失足”。在刚果事件中，还是得罪了苏联。苏联要求其辞去秘书长的职务。在西方的保护下，哈马舍尔德虽逃脱了苏联的责难，却不幸于飞机失事。他是第一位殉难于职的秘书长。

秘书长：最初的几任秘书长总是受到苏联的非议。

教授：当时秘书长从欧洲颇为中立的国家选任，这些人在当时西方势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骨子里倾向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苏联的不满。

那时苏联不仅批评在任的秘书长，还企图永远解决秘书长倾向西方的问题。苏联提出了一套三驾马车方案：联合国秘书长由三个人共同组成，一个是西方国家的代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一个是不结盟国家的代表，遇事必须要三人一致同意方可实施。

这个提议本身显然有些荒唐。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扯皮机构，秘书长再由几个人共同担任，就可能使得联合国不仅作不出重大的政治决定，甚至连日常事务也会陷入瘫痪之中。西方反对

苏联的提案，不结盟国家也认为这不是一个有利于联合国更好开展工作的提案。苏联的提案没有认真讨论即遭搁浅。

秘书长：秘书长不是世界领袖，头两位秘书长的实践毫不客气地受到大国的警告。但秘书长毕竟是庞大的联合国组织的行政负责人。由于秘书长职位的象征意义和它实际具有的巨大的影响，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国政治交易的一个焦点。

教授：联合国宪章并没有明文规定秘书长由什么样的人充任。没有明文规定，而自一开始就似乎已约定俗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民不担任。带有明显倾向性国家的国民难以为大家所接受。最有资格出任秘书长的是那些中小国家的外交家，特别是那些在政治上奉行中立或走中间路线的国家。不仅有国家的选择，还有地区的选择。不成文的原则是各个主要地区的国民轮流担任。

欧洲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联合国初期的秘书长人选上占据优先的位置。前两任都是北欧人。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最初加入联合国的亚非国家不多，其外交官更不为传统的大国所赏识；美洲国家似乎是美国的后院；西欧更站在冷战的一边。如是，政治上较为缓和和中立的北欧，是苏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

第三任秘书长选择了亚洲缅甸籍人吴丹。缅甸不大不小，外交立场比较居中，苏美两个阵营还能够接受。

第四任秘书长又转到了欧洲。奉行中立政治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被任命为新的秘书长。瓦氏深解在超级大国对立时秘书长的角色，在超级大国面前只作“秘书”不作“长”，东西讨好，两面玲珑。瓦氏在任10年，与两个超级大国相安无事。两任期满后，瓦氏意犹未尽，还谋求第三次连任。瓦氏没有想到，讨好超级大国，却得罪了正在升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连续多次使用否决权，瓦氏终于知难而退。瓦氏成为被发展中国家赶下去的秘书长。

第五任秘书长转到了美洲。南美秘鲁人德奎利亚尔坐上了秘书长的宝座。两届期满，非洲埃及人加利接任第六任秘书长，任满一

届按常规谋求连任，却因得罪了美国，为美国坚决反对，只能作罢。另一位非洲人安南接替。

从 20 世纪的这几位秘书长看，大多数受到大国的责斥。不过在联合国这第一个 50 年中，秘书长的任职初步形成制度。特别是地区轮换，已成定制。欧亚美非，每洲各任 10 年。秘书长本人连任不超过两届。这样的制度并不一定理想，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减少秘书长人选上的不必要的纠纷，排除超级大国的过多插手。

中国对瓦尔德海姆的否决，对秘书长的选任惯例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制止了个人连任三届的企图，从此无人再有此打算；它结束了欧洲人企图把持秘书长职位的历史，强调了秘书长人选的地区原则；中国的否决还提醒今后的每一任秘书长，秘书长不能一味迎合大国的需要，必须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秘书长：联合国的前 50 年，风风雨雨中秘书长选任终成惯例。就秘书长来说，有了惯例的保证，受超级大国支配的因素有所减弱。后来的几位秘书长，任期较为顺利，大国没有刻意否决。

教授：21 世纪，秘书长的选任似乎从联合国范围转移到地区范围。每当轮到某一地区出任秘书长的时候，地区之中的磋商极为关键。究竟地区内哪一国人士出任，需要取得地区各国的认同。地区一致推荐的人选，在联合国大会总是程序性地被认可通过。秘书长从大国支配中初步得到解脱。

21 世纪以来，亚洲的斯里兰卡、欧洲的冰岛、美洲的墨西哥、还有非洲的摩洛哥等先后按照地区轮任秩序被推荐为秘书长。有的秘书长在中途辞职，那不是大国的否决，而是依据地区的协商，让地区内的其他国家人士接任。

秘书长：过去一些被认为边缘国家的人士陆续出任秘书长，在联合国刚刚成立之时是想象不到的。

教授：这在根本上反映着发展中国家兴起的潮流。最初，秘书长总想从欧洲人中遴选，这是欧洲中心论的反映。20 世纪 50、6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后，新兴国家加入联合国，逐渐改变了联合国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在数量比例上下降了，政治影响也下降了。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它们中的杰出人才，完全具备担任国际组织领导人的才下。没有亚非拉新兴国家的兴起，秘书长一职恐怕大多数还要为欧洲人把持；更谈不上这个职位为各地区轮流担任。

新型秘书长

皮斯·李从中国留学毕业之后，2015年受岛国的推荐到联合国任职。先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发展事务部工作，2035年提升为发展事务部总干事。2040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

2044年第99届联合国大会上，澳大利亚代表南太平洋地区推荐55岁的皮斯·李出任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一致通过了这个提名。李先生具备最优越的条件：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而他是华裔血统、美国出生；亚太地区是发展最快的地区，他具有太平洋岛国的国籍；联合国管理职能凸现，他是联合国行政官员出身。这是华裔人士首次出任秘书长，也是非政治官员首次出任秘书长。

秘书长：世界几个主要地区如欧亚美非至今出任过两次秘书长，最近才轮到南太平洋地区。在地区磋商会议上，当澳大利亚外长推荐我作为秘书长候选人的时候，我心中还有一些犹豫。因为过去出任秘书长的虽然算不上是世界大国，但都是中等而且比较出名的国家。如挪威、瑞典、缅甸、秘鲁、埃及等。而我只不过来自几万人的新兴的小国。

教授：过去这样的小国是不“够格”的。你今天所属的太平洋岛国，只能算是前任秘书长吴丹所言的“微小国家”范畴。那位

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秘书长，那时都认为象这样“微小国家”不应该成为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只能作为准会员国，或只能加入那些联合国的各种专门机构。客观上说，那时发展中的微小国家，参与联合国主要是寻求国际开发组织给予的援助。它们需要享受联合国宪章给予的权利，而本身国力的弱小，履行国际义务显得有些困难。所以，以前选任秘书长，微小国家是不予考虑的，虽然并没有明文规定这样作。

现在国家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淡化了国家大小的因素。

秘书长：我们这样的小国出任秘书长，有很大的偶然性。

教授：偶然性总是必然性的一种反映。南太平洋地区推荐你出任秘书长，而不是地区大国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这有一定的偶然性。我觉得他们主要考虑的是你个人的声望，而不是所在的国籍。

要是在 20 世纪，南太平洋岛国地区被认定是国际政治的边缘地带或称为真空地区，那些世界列强没有把你们那个弹丸之地看作是能出人才的地方。但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小国甚至微小国家的人们迟早会有机会成为联合国秘书长，这是必然的。

秘书长：我当时还顾虑有入在血统的问题提出责难。

教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民不担任秘书长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英国著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曾想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但在这一条面前知难而退。

你在这个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你虽然是华人血统，但从法律上，从你的父辈起就不是中国人了。而按照美国的“落地法”，只要在美国出生的人就自动取得美国的国籍。你从法律上倒可以是美国合法的公民。你在澳大利亚居住过，与地区大国也有亲密关系。澳大利亚的举荐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当然，你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而是现在所在的岛国人。在国籍问题上挑不出毛病的。

如果就个人经历分析，你最佳的定位是“联合国人”。在美国